

从城乡融合发展看乡村全面振兴

■闫琳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在尊重农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塑造乡村建设新面貌,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发展与时代特征相对应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这是在乡村振兴发展总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阶段目标和实施路径探索。

过去20年,我国城镇化率从约40%提高到60%以上,城乡关系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发展”再到“深度融合”,城乡发展政策导向也逐渐从“以城带乡推进城镇化”转向“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时代,传统的“线性发展逻辑”正在被打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地区发展诉求差异巨大,但也同样具有“跨越发展”和“创新涌现”的机会。

在此背景下,乡村发展的

阶段目标更要与时代特征相对应。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促使人们对城乡价值不断反思,进而转变思维方式。当前,城市高密度、高效率所带来的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紧张感与焦虑感,需要更多样地释放空间。与之相对应,乡村在城乡深度融合的再分工中,越发显现出了生态、文化、景观和心理疏解方面的价值优势。在此背景下,未来城乡空间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也对未来的乡村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城乡关系的复杂变化,笔者认为,未来的乡村规划应进一步聚焦于促进中国式乡村的现代化和全面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两个方面。促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既要与普遍城镇化、现代化接轨,探索未来乡村规划的新路径,还要保持住“乡村性”,也就是乡村独特的空间基因,比如以生态和自然为基底的聚落形态,体现时间和生命痕迹的建造模式,以及亲缘地缘主导的社群关系等。这是当代乡村规划的基本要求。

从城乡融合到城乡等值

城乡融合是城乡人口、产业、人居、文化等要素逐渐交织融合,呈现一体连续的空间特征。在此过程中,城乡等值概念逐渐得到强化,城乡融合体现出新的变化趋势。

城乡人口流动呈现更加多层次、多元化,需要重新审视城乡空间的关系与价值。在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我国城乡人口普遍呈现“乡—镇—县—城”的单向梯次流动特征。然而,随着城乡交通、信息等各类设施不断开放与通畅,人口流动越来越呈现出“跨越层级、城乡双向、循环往复”的特征:乡村人口直接向县城或更大的城市迁移,一、二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差异以及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使人口流动意愿呈现向城市(大城市与县城)和乡村两头集聚,人口兼业、城乡通勤、城乡双栖等“半城镇化”特征也愈加明显,城乡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城乡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三产深度融合发展重塑乡村空间价值。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推动了农业产业的结构性转型,非粮食品需求大幅增加,快速物流配送也促成了农业产业链的新组织模式,更加速了三产深度融合。乡村空间的生态、绿色、美学等特色价值也在催生更加丰富的“乡村空间产品”,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动能,文旅休闲、康养度假、生态研学等新发展动力正在激活对乡村空间价值的再认知。

随着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空间资源配置和空间品质建设加速提升。交通、物流、科技、信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速了城乡生活方式的

接轨,人们对现代美好生活的追求,促成了城乡人居环境的全面提质。尤其是与城市生活相比,乡村绿色、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更多认可与推崇,也促使乡村出现更加丰富多样的功能形态。这既对乡村土地管控和空间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乡村空间建设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城乡文化融合催生了乡村美学的新价值,乡村空间价值不断提升。我国乡土文化基因深厚,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碰撞带来了人们对乡村美学的再认识。随着乡村空间价值不断显现,那些自然生态良好、朴素真实、充满烟火气的乡土空间与生活场景,以及与现代生活结合后所呈现出的“新乡村美学”,成为当下弥足珍贵的文化根脉,城乡价值天平由此多了一个新砝码。

综上所述,所谓城乡等值,是将城乡各类资源放在统一的价值体系中评估,让城乡群体享有同样生活品质的权利。由此,笔者认为基于城乡等值概念的乡村规划思路也将发生显著的变化。

城乡等值视角下乡村规划新导向

乡村规划在推动城乡等值发展中极其重要。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应围绕城乡融合时代下的城乡等值理念,以更加多元的人群需求为根本,

转变“改造乡村”的传统思维,探索“学习乡村—参与乡村—共创乡村”的未来乡村规划新模式。

学习乡土空间中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朴实无华,但却充满生态智慧的建造模式。未来的乡村规划不应是一张张标准的设计图纸,而应该让村民都“看得懂、建得起、觉得美”,让朴素实用的乡土美学重新回归乡村土壤中,焕发更广泛的生命力。

深度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未来的乡村人群是多元的,乡村功能是丰富的,具备让艺术、文化、创新萌生的环境。由此,乡村规划不应当是一张静态的蓝图,而应是一个不断动态调整的行动方案,通过持续的陪伴和共同探索,塑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空间场景。

以文化为基石,共同创造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地方文脉是乡村发展的根与魂,时代的急速变化既需要人才队伍进入乡村,更需要那些发自内心“珍视乡村”的人共建乡村。因此,乡村规划不应是对其他生活的复制或替代,而应让本地文化萌发新芽,实现创新,让乡村成为凝聚新人群、体验新生活、探索新思想的新社区,成为“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都热爱的乡村生活共同体。(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推动高标准碳市场建设

■韩融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并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等提出了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必须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无论是突破已有的资源环境瓶颈,还是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都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绿色低

碳发展经济政策,特别是要将碳排放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统筹推进。

作为一种新型交易方式,碳排放权交易本质上是把碳排放权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社会碳减排成本最小化和产出效益最大化。碳排放权交易是将碳排放的外部社会成本内化于企业生产成本之中,可以倒逼企业节能减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碳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还相对较短,市场尚未完全成熟。进一步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需要在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建设高标准碳市场体系,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备的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

从碳市场自身发展情况看,现阶段碳市场在产品、服务和要素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要素循环受阻,对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有效发挥具有负

面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而高标准碳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切实解决目前存在的碳交易多体系并存、纳入市场的行业和参与主体不够丰富、碳排放数据质量不高、市场活跃度不足等问题。

今年3月,《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明确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逐步扩大适合我国碳市场发展的交易主体范围。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今年年初启动以来,运行总体平稳。一系列成果表明,我国完整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面向未来,还需立足现实推动高标准碳市场建设,在扩大规模、统一规则、激活市场上下功夫。

一是推进碳市场扩容。单一市场的有效规模相对有限,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也会

受限。国内外成熟的碳市场均纳入了不同行业类别,并随着碳市场的发展不断丰富行业类别及交易产品类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提出排放约束,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也对碳市场扩容提出了明确要求。统计数据显示,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航空这八大行业的碳排放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5%左右。需基于对不同行业的综合分析,将上述相关行业逐步有序纳入碳市场,持续增强碳市场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管。就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内部连接来看,既要统筹考虑碳排放配额与绿电、绿证交易之间的互认机制,完善公平合理、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的核算转化规则,又要通过明确的权益归属实现绿证和碳市场协同发展。就提升碳排放数据质量

来看,需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核算方法,强化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持续提升绿色金融市场透明度,提高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便利性。

三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立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现有绿色金融标准之间目前协同度较低,部分标准还未进行相应调整和修订。建议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约束条件,以不损害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原则,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导向,对绿色标准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形成有效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促进碳市场高效运转,为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持。(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